



# 对津味儿的多维度辨析、注释与定义

——读津味儿小说近作有感

刘卫东

从此前的作品和研究来看,津味儿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出现且不断被丰富和拓展的概念。作者是天津人,故事主角是天津人,发生的地点是天津,方言、地标均是天津符号——长期以来正是这些元素不断组合发酵,建构了津味儿文学。2011年出版的《小说月报·风味小说·天津卷》的“编后记”说,该书是从《小说月报》三十年来的作品中“带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作品精选之后的结集”“是读者非常好的了解天津这个城市的往昔和今朝的路径”。虽是《小说月报》的独家视角,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窥见津味儿小说的基本阵容:蒋子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冯骥才《神鞭》、张仲《龙嘴大铜壶》、林希《高买》、赵政《偿还》、肖克凡《一九三五年的真相》、王松《梅生》、龙一《潜伏》、李治邦《津门十八街》、武歆《老工人谢瑶环》。当下语境中,作家承载着将津味儿文学发扬光大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我的阅读视野内,最近几年颇出现了一批津味儿很足的作品,好看耐看,实现了对此前津味儿的超越,是沉甸甸的收获。因此,本文拟以近期几部作品为中心,漫谈一下津味儿发展的几个维度。

津味儿在文学上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清末民初时期天津作为华北大商埠“新旧”混杂、碰撞的集体记忆,这是其他城市很少或没有的。那些在故纸堆尘封了很久的奇人怪闻在1980年代被打捞出来,给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津味儿立足生根的基础。在当下,这座富矿如果按照既定方法开掘,相信还能有源源不断的产出,但是难免会发生同质化现象:一件奇事刚听后曰奇,然而故事越来越多、愈来愈奇,就有点审美疲劳了。林希的近作《沾上纪闻》,顾名思义,还是写津门

奇闻怪事的“路子”,但作为这条“路子”的开创者之一的作者却对作品进行了“升级”——新作的故事仍然起伏跌宕,但多了出自存在主义哲学的对人物境遇的考察,同时,还有了作家晚年对世事人情的“看破”感和写作时的“游戏”感。《流浪汉麦克》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洋穷人”,他到天津下游轮时穿了一双捡来的名牌皮鞋,结果被中介机构特殊招待,认为他是富人;又因为偶然机会卖德国缝纫针和刀具而发了小财。结尾他去看不失火的热闹,结果被踩丢了鞋,再度沦为流浪汉。人物的命运浮沉竟然与一双皮鞋的得失紧密相关,虽然津味儿作品中的“奇”是标配,但麦克的故事已超越了现实的“奇”而进入了现代主义的荒诞状态:不是人和事奇,而是它们发生的语境奇。从具象的奇到抽象的奇,林希用“津门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笔法,使《沾上纪闻》中的很多故事增加了荒诞的味道,这种津味儿也是仅有经历过时代巨变且生性乐观的“老林希”的作品才能散发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林希对此前创作的延续,但他变化的一小步,正是津味儿写作需要思考的新问题和新空间。

如果想要“奇”的效果就要有一定的神秘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很多经典津味儿作品都是只写人生“片段”的中短篇,因为从头道来的清晰故事会损害津味儿离不开的“奇”。但是,引发的问题是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藏头露尾,写得不够充分,缺乏建构性质的用宏大视野看天津的鸿篇史诗。王松的《烟火》不再纠结于写个人的“奇”,而是将近代天津作为叙述对象,关注焦点也从怪人异闻转向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烟火》写了侯家后墙头儿胡同的百年变迁,刻画了来子、尚先生、小阔

女、老瘪、王麻杆儿、杨灯罩儿等人物形象,因他们职业各异且有交集,所以在民俗的展示上是淋漓尽致致的。同时与以往的津味儿叙述有不一样之处:一是拉长了时间线索,把切片式的天津剪影变成了有始有终的“胡同儿小史”,从而更具有历史感;二是描摹了胡同儿里的平民人物群像,不再执着于写与普通人有很大距离的异人奇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中带上近代天津的全貌。因此,《烟火》不只是综合了此前叙述天津的经验,还有将其熔为一炉的努力——这依托于作者使用的紧贴人物心理的“心理分析式”笔法,其细密的针脚、生活化的节奏也与此前津味儿写人物讲究白描和外部观察的手法有很大差异,无疑是津味儿写作的新探索。

很多作家都已经意识到,如同“我注六经”一样去书写津味儿很难再出新意了,而采取“六经注我”的策略,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就可以获得独属于自己的津味儿。因此,当前津味儿作品的一大特点是作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来写津味儿,十分引人注目。肖克凡对天津工厂的变迁非常熟悉,所以他在写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时,选取了观察这个过程立足点,从当代工人二代的视角看共和国具有身份自信的“工人阶级”的精气神。宋安娜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骨头》中同样有别的作家很难复制的内容,即她多年采访、关注的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天津”的史实,不仅化用了自己积累的独家资源,还写出了儿童视角中小洋楼里的津味儿。这些作品代表着可能写出有新意的津味儿的方向,因为从自己独特视角发现的故事,无疑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检视津味儿题材作品,晚清民国、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故事是很多的,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天津是孕育传奇故事的绝佳温床,相对而言共和国时期尤其是1970年代天津的特殊性被开发得还不够。一般而言,作家很少把故事同时放在这三个时段内呈现,所以在很多津味儿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断代”的。用一个人物在天津的长时段经历来贯穿,是武歆的《赶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少年纪洪寿民国时期由山东宁津来到天津,在缝鞋小作坊艰难谋生,1949年后进入国营工厂当了充满自豪感的工人,1980年代初退休。作为工人的纪洪寿在胡同里度过的时光是以往的作品不大涉及的,因为它与刻板印象中的津味儿传奇相反。作品写了天津大杂院里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民俗“老例儿”的传承——津味儿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与不同的时代同频共振。武歆的《赶路》讲的是“来路”,他把自己的体验编织进一个工人的成长史,重新定义了独属于自己的天津人概念,长期以来津味儿过于依靠传奇而脱离日常生活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部分解决。

津味儿是一个宏大概念,如果落实到个人理解肯定是人言人殊的,所以作品一定强求统一的津味儿的话,就必然形成固化思维——作家写津味儿就盯着某几个元素,题材变得狭窄了,腾挪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津味儿由于符号化具有独特性,一成不变也会自缚手脚。所以,津味儿文学写作的突破点就在于作家依靠自己的“绝活”发现、拓展新的空间,重新梳理、整合此前的津味儿资源,并完成对它的重新定义。这样,津味儿文学才可以达到守望和变迁的动态平衡,生生不息。

“思妇”形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叶嘉莹先生认为男性笔下的女子有两种感情类型,一种是期待,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我无论如何都要等待他;另一种是奉献,如“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我要把我自己奉献出去,一辈子追随他。女性诗词中的男女之情是否也以“期待”和“奉献”为主要表现呢?

李清照和赵明诚是历史上难得的模范夫妻,爱情佳话。他们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夫妻犹如良友,这使得李清照的爱情词自然真挚,分外动人。“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宛然一个慧黠活泼的女子。宋室南渡之前,李清照即便是写离别相思,也并不流于凄苦绝望。“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独具巧思;“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楚楚动人;“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虽然是在为相思而洒泪,但词中风晴日暖的春天,脉脉含情的梅柳,浪漫的酒意诗情,仍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明媚闲适的气息。李清照与丈夫的感情更像平等交流的文章知己,她也会思念,也会等待,但视角是平视而非仰视的。当然这与李清照的正妻身份有关。明末清初诗人黄媛贞为人侧室,她有一首《与夫子索梅喜得诗以谢》:“春气无缘人,东风代开门。折来枝上叶,将作掌中恩。遥谢南轩主,承开寤寐言。”折梅相赠是风雅之事,黄媛贞向丈夫索要一枝梅花,也如愿以偿得到了,但从这首诗的口吻不难看出,她对丈夫明显有一种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仰望。

男性诗词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高度艺术化了的形象,在男女相思之外还会寄托君臣之义。女性笔下的情感书写则更加日常化、生活化。李清照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闺秀,她的词自然妥帖也精美工致。历史上还有很多不甚知名的女性作者,她们的相思离别之作更是细腻朴拙。唐代晁采的《子夜歌》:“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剪之特寄郎,聊当携手行。”剪下指甲寄给爱人是非常私密的事,晁采幻想爱人收到指甲带在身边,就像牵着自己的手出行。更多时候女子想要寄给丈夫或情郎的是衣服,她们写到制衣寄外,不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那样简洁凝练,而是会写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明代刘氏《寄衣》中写道:“剪刀未动心先碎,针线才缝泪已多。长短只依元式样,不知肥瘦近如

## 女性诗词中的男女之情

女性诗词漫谈(八)

于家慧

何。”她怀着深切的思念动手缝制衣裳,尺寸只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因为离别太久,她已不知道爱人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这种体验只有真正留在家中痴痴望望,真正拿起针线缝衣的人才能产生。

男性诗词中的思妇形象通常是深情且坚贞的,不是在等待,就是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之情是十分复杂的事,正如唐代女诗人李冶所言:“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恩爱夫妻之间尚且有怀疑试探的时候,何况在古代包办婚姻之下,又有几对夫妻能像李清照和赵明诚那样恩爱笃情呢?黄媛贞也曾给出门在外的丈夫缝制衣裳:“宵深怜指冷,好月待初临。彩线传针密,寒衣下剪深。非关灯不奈,应是酒难禁。未常为念,空教一片心。”她在深夜里裁剪缝制,手指发冷,困倦寂寞之时忍不住怀疑自己这份用心能否得到珍惜。

留守家园的女子对远方的爱人有种种怀疑猜想,原是人之情常,黄媛贞的表述还是比较含蓄的。宋代士人妻《寄鞋袜》诗云:“细林官鞋巧样新,殷勤寄语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尘。”唐代的平康坊为妓女聚居之地,后来成为烟花柳巷的代称,这名女子给丈夫寄鞋袜当然是出于关怀思念之情,但也在提醒丈夫不要踏足烟花之地。清代的陈莲蓬在寄外诗中写道:“床前明月冷于霜,病枕难安寒夜长。遥想应官听鼓客,此时正学野鸳鸯。”

我们启程时,天光还未大亮。同行的几位都是兴致勃勃的,脚步轻快,谈笑风生。起初的路是宽阔的石阶,走得毫不费力。可不过半个时辰,路便分了岔。一条是游人如织的平坦大道,一条是隐入林间的蜿蜒小径。大多数的人,想也不想,便汇入了那喧嚣的人流里,他们的身影与笑语,很快便被更浓的雾与更多的人声吞没了。只有一位沉默的朋友,头也不回地去了。

我忽然想起王阳明先生的话来:“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那走入人群的,固然是热闹的,安全的,但他们可有一个非要抵达不可的峰顶吗?抑或只是随着人潮,走到哪里便算哪里?那位独行的友人,此行不为消遣,只为寻访山顶一座荒废已久的古观,去拾一片传说中的碑文。他的步履因此是沉稳的,坚定的。这便是一个“择善而行”的君子吧,先确定了遥远的目标,然后便将自己交付给孤独的路途。

我走的,是一条中间的路。既不愿随波逐流,又缺乏友人那般孤往的决绝,便拣那更陡,却也并非无人的石径,慢慢地走。走得累了,在山涧旁一块大青石上坐下。耳边是淙淙的水声。我看着那溪水,从不知名的源头流下来,撞在石上,散作珍珠又聚拢起来,绕过去,似乎没有一刻迟疑,只是一心一意地向着山下流去。这溪水,像极了互联网上那句有名的警句:“在

做每一件事前,要充分认识自己。”日曰流淌,便是在反复地照见自己;冲刷着河床,也如同涤荡着自身的杂质。它不就是在“以己为镜,明其得失”吗?听着这亘古的流淌之声,心也仿佛被洗过了一般。方才因攀爬而生的些微焦躁,因比较而起的一点茫然,都在这清流中沉淀了下去。我在想,自己为何要登



山?是为了那“会当凌绝顶”的虚荣,还是为了途中看到这一草一木的欣悦?水声仿佛回答了一切,它让我警醒莫要迷失在这单纯的劳累里,忘了来时的初心。歇够了,起身再行。山路愈发陡峭,呼吸也粗重起来。这时遇见一位老人,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钉钉子一般,踏得实实在在。我与他攀谈,得知他竟是这山中的常客,数十年来每周必至。我问老人何以坚持如此?老人笑了,脸上的皱纹像秋日的菊花那样舒展开来。他引述的是诸葛孔明的话:“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年轻时忙于生计,总觉得学问是遥远的事,老了,闲了,反倒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

在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即将迎来创办120周年之际,回顾天津近代女学教育的历程,可进一步确认,天津近代女学教育的兴起是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国社会“男女平等”思想觉醒的标志,也是中国妇女成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摇篮。

位于京畿重地的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新式教育体系纷纷建立,女学教育改革的探索之路亦走在全国前列。1902年,严修自海外考察归国后创办严氏女塾,首开天津地区国人倡办女子学校的先河。1904年,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普及教育”为宗旨的北洋女子公学在天津河北三马路一带正式成立。1906年,北洋女子公学增设师范科,学校遂改名为北洋女师范学堂。此外,天津县官立女子小学堂、立达女学堂等女子学校纷纷创建成立。截至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之前,天津女学计17所,学生807人,各项数据均领先于北方其他城市。

天津近代女学教育发展不仅追求数量,还颇为重视质量,各大女学都采取措施大力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成效。以北洋女师范学堂为例,肇始之初,其创办者傅增湘就制定了完备的《北洋女师范学堂章程》,明确“以养成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女教员,期于女子普及(教育)”为办学宗旨,并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堂管理和学生管理等内容作出了细致严格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学堂还从师范生职业化培养的目标出发,专门开设教育这一科目,用以教授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从而保证学生既具有良好的全面的综合素质,又具备专业师范生扎实的职业素养和教学能力。1907年12月,北洋女师范学堂第一期78名学生毕业,其中,最优等毕业生14名,优等毕业生16名,她们中的大部分投身于教育事业,成为推动近代新式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发展的新生力量。

天津近代女学教育的兴起赋予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平等权利,让女子走出家门、走进课堂,不仅习得知识、锻炼身体、开阔视野,还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自我认知,逐渐接触并走向社会。比如,各大女学均开设有体操课,其本意旨在强身健体、提高协调能力,但由于体操运动要求解放双足,入读的女学生若非天赋就得放足,因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此外,各学校还定期举办运动会,并邀请社会人士参观,在为女生搭建加强体育锻炼的竞技平台的同时,增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之间的联系,培养并向全社会展现新式女性自信自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许多女学不仅精进课堂教学,还积极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学校开展实地考察和参观访问,让学生亲身体验、观察和参与社会实际,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得到大幅提高。

随着天津近代女学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深闺走进学堂、走向社会,她们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自主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觉醒和增强,她们积极追求自我解放和平等独立,主动担当作为,勇敢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她们发起女子赈济会,组织女子赈灾团,积极为灾民难民奔走筹款和慷慨解囊;开设幼女教养所、正道平民校和妇女补习学校等,帮助贫苦大众重燃希望;组建“中国女子禁烟会”,参与发起“女子促进社”“家庭改良会”等社会团体,倡导社会文明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天津女学的学生们冲破传统束缚,觉醒自立,敢于发声,勇担责任,在社会上逐渐崭露头角。

北洋女子公学的倡办人之一吕碧城曾提出“女国民”观,认为“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20世纪初,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际,一批在政治上率先觉醒的天津女学学生及其毕业生勇敢地担负起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之中,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女学界迅速声援和响应。5月25日,由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刘清扬、邓颖超和郭隆真等人发起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告成立。这是天津首个妇女救国团体,成员大都来自或毕业于天津各大女学,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爱国心”为宗旨,是组织和领导天津女界爱国解放运动的核心力量。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积极组织成员参加游行示威和宣传抗议等活动,并创办《醒世周刊》和《平民》半月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使新思想、新文化乃至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广大妇女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其骨干成员刘清扬、邓颖超和郭隆真等也在带领广大妇女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日益成长。

1919年9月16日,天津进步青年合组的社团觉悟社宣告成立,在这里,刘清扬、邓颖超和郭隆真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们一起,研习新思想、探索革命真理,逐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3年4月25日,邓颖超、李峙山和李贞儒等在天津发起成立女星社,以此为依托,通过创办发行《女星》期刊和《妇女日报》,开办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星期妇女义务补习学校,联名发表力争女权之通电,积极筹组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精神,推动女性教育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动员社会各阶层妇女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是在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们的领导下,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发动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题图上:北洋女师范学堂更名为河北省立师范学院后,学生在做物理实验。  
题图下:北洋女师范学堂图书馆大楼。

是他便立志要将年轻时想读而未读的书,一本本捡起来。“这吧山,便如读书。”他指着前面的石阶,“一阶一阶,便是那一页一页。不坚持,便永远停在某一页上,后面的风景,就看不到了。”知道自己所欠缺的,便在这山路上,在书页间,孜孜不倦地做着“广才”之功,他那份从容与内心充实竟比山间的风光更令我神往。

我终于站在了山顶。风挺大,吹得人几乎要站立不住。放眼望去,群山如海,城池如棋,天地壮阔得让人一时失语。奇怪的是,我心中并无多少狂喜,反倒是一片澄明的宁静。那一路的辛苦,此刻都化作了脚下坚实的土地。我忽然明白,那“志”,并非一个僵硬的终点,而是贯穿于每一步中的抉择;那“省”,是途中让灵魂跟上的片刻休憩;那“学”,则是这整个攀登的过程。

下山时,我又看见了那条小溪,它在山脚下汇入一条更宽的平静的河中,失去了那清越的声响,却拥有了更深厚的力量。想起那位独行的友人,想必他已在古观中,用拓包一下下地叩问着那沉默的碑文;还有那位好学的老人,此刻或许正就着一盏孤灯,展开他新的一页书卷。他们都走在自己所立的志向向上,像那条溪,那座山,那盏灯。而我,也走在我自己的路上。人生便是这样一场攀登,重要的不是最终站到了哪里,而是在这一路上,我们是否真正地在“在”过,是否听从了那些古哲的箴言,为自己寻得了一把“舵”,一副“衡”,然后,飘荡也罢,奔逸也罢,终能问心无愧地说:我知道自己为何而行。

## 巾帼先驱的摇篮

王敏



天开图画(中国画)

李旭飞

第五四〇七期

## 满庭芳



沾上丛话